

索

善

尼

辛

事

件

張潤梅

蘇俄作家索善尼辛的新書「古拉格羣島」，一九八一—一九五六」去年年底在巴黎出版，今年二月十二日作者被政府逮捕，十三日被放逐。這中間的一個半月內，蘇俄當局與作者之間由對峙到僵持，由冷戰到熱戰；事態演變急速，引起世界各地的關切與注意。這自然不是一項單獨的突發事件，它的促成因素、背景，以及牽涉的政治問題，都超過一個個人案件。本文擬就這幾點試作簡單分析。

「古拉格羣島」這部紀錄蘇俄勞工營實況的書，已完成數年。作者於一九五八年便開始搜集資料，一九六四年着手撰寫，一九六八年完成。全稿包括七部，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巴黎所出版的六百頁俄文版，僅是七部中的前兩部。題目中「古拉格」一字，原文是「中央勞動改造營總署」幾個字第一字母所組成。作者取此書名，用以象徵佈滿各地難以數計的勞改營及囚犯運輸網，在蘇俄國土上像密佈的羣島，上面住着數以百萬計的不幸囚民。所記實況是根據索善尼辛本身十一年囚禁及流放的經驗，及二百多人供給他的資料。寫成後並未急於出版，因為提供資料的人有許多還在世，恐怕累及他們的安全。稿中的內容也未曾在地下出版物中披露。就連稿件的存放，也極其小心，是分藏於幾處不同地方。但是消息還是不脛而走，秘密警察極力搜查，急於探知其中內容。去年（一九七三）八月底，一位名伏洛尼安斯卡亞的婦女在列寧格勒被捕，經過秘密警察五天連續不斷的審訊後放出；她回家後便自縊而死。她是保存稿件者之一。

事後回顧，很容易看出自從這位婦女被捕自殺後，索善尼辛與官方都各自積極準備。索氏曾數次表示如果他本身遭遇不測，他的文稿已有妥善交待，也就是絕不屈服。官方原來就為「反叛」作家在國外出版而惱怒，於是去年春天加入了國際版權組織，據此得以干涉蘇俄作家在國外出版事；到九月廿一日又成立了「全國版權社」，以法律制定蘇俄作家在國外出版事

務必需由該社統一管理，私人不得為之。到十二月下旬，「古拉格羣島」出版的前一週，全國出版社理事會主席潘金接見記者，在為時九十分鐘的談話中重申該社的權責。他說如果外國出版商刊印蘇聯所禁的俄人作品，該社將以法律起訴，如果蘇俄公民私送稿件到國外，則將按走私罪逮捕，可判十年監禁五年流放之刑①。十二月廿七日（亦即「古拉格」出版的前一日）蘇俄消息報公佈蘇聯部長會議所通過「有關全國出版社」的決議案，詳列該社權責，最後並說明凡違反所列舉之各項程序而對外自行交易出版事務者、當事人需負法律責任②。但是對於索善尼辛，這些即時特設的機構和趕制的法令，並未發生阻嚇之效。「古拉格羣島」終於在一九七三年年底首先與它的俄文讀者見面。

索善尼辛認為官方既已搜獲了他的稿本，使他沒有選擇餘地，只好提前將書出版。他向專制當局挑戰的勇氣贏得普遍欽佩，而這樣以身試法的冒險也令他遍及全球的讀者着實担起心、担心的等待蘇俄官方的反應。在等待期間，外國記者問索氏本人的推測。他回答說：「我不作預測。對於那些被苦刑折磨死的人，我盡了責任。這倒使我感到安心平靜。真象曾經被遮瞞、踐踏、焚毀，如今又得以恢復完整並且刊印出來，沒有人能再將它一筆抹煞。」③

蘇聯的報紙對此書的出版保持了五天沈默，到一月二日晚塔斯社開始攻擊。但是此後多日對索氏的抨擊言論顯得空洞無力，始終避而不談「古拉格」一書的內容，只反覆指責索氏說謊、誹謗、幫助敵人、阻撓國際局勢和緩

等等，最後就加了「賣國」的罪名。「賣國」是可以處死刑的。對於新書先是籠統批評，說無文學價值，後來斷章取義說作者稱讚納粹、嚮往沙皇。那是基於索善尼辛在書中所作之統計，說史達林時代勞工營中在同時期內囚禁人數高達一千七百萬，超過納粹與沙皇時代的紀錄。

除文字與廣播抨擊外，官方也安排了「人證」，將索氏青年時代朋友尼古拉·維克維奇找出與索氏會晤。尼古拉即二次大戰時與索氏通信批評史達林的人，會晤時他說索氏在大戰末期出賣他與另外數人，以致他們也無辜被捕。尼古拉雖特別聲明他出來作證出於自願，官方却在十天以前便備好發出的消息，與美國報紙接洽刊登事項④。關於此事索善尼辛於二月三日發表一項聲明，說他的朋友於沈默了二十九年後出來說這些話，實在是爲了挽救他的科學事業。（尼古拉自謂現任一科學機構的主任，但不告訴記者該機構的名稱和地址。）索氏自謂他在獄中行爲並不英勇，但自幸並未拖累他人入獄。⑤

索善尼辛反駁中也譏諷官方如此反覆抨擊，爲何不告訴國人那書的內容究竟是關於什麼。他曾屢次提及寫書的目的不是給外國人閱讀，而希望本國人、尤其青年一代，能知道歷史的真相。除了抗議官報斷章取意曲解內容外，他又指出有些斷章引用的原文是屬於尚未出版的部分，這種資料唯有從秘密警察處才可獲得！

雙方的口頭「罵陣」到二月十日便具體化爲行動。十日與十一日官方傳訊索氏均遭拒絕。索氏第二次拒絕接收傳票時，且備好書面聲明，說他認爲俄共政權本身原本就不合法。二月十二日被捕時，他已將事先備好的一份稿件分發出去，那就是「古拉格羣島」的第七部最後一節的摘錄。該書全名原包括「一九一八—一九五六」年代的標明，但是第七部最後一節寫到一九六八年實況，所批評當時的政權也就是今日的政權，題目是「今日的法律」；作者在文中說，這個題目也可改爲「今日的無法」。

蘇俄當局對索善尼辛的處分，必經過慎重的考慮，對於西方的反應也有所顧慮。在目前情形下，放逐或許是比較最恰當的處置。放逐之後，俄報評論也露出用意所在：「現在索善尼辛已在西方，對於那些反動的外國人，他將無法再引起他們的興趣。而成爲過氣（人物），漸被淡忘。」⑥索善尼辛則說他要力爭住在自己國土上的權利。

索善尼辛生於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北高加索的基斯洛夫斯克，出生時他父親已去世半年。他的父母都是出自地主家庭，革命後雙方家產全被充公。索氏六歲時隨母遷至羅斯托夫居住，其母任打字員，維持家用。索氏在羅斯托夫大學讀數學與物理，成績優良，爲榮譽生。曾得史達林獎學金爲升研究所之用，但他嗜愛文學，用獎金讀了莫斯科哲學文學與歷史研究所的函授課。一九四一年修畢函授課，在羅斯托夫一所中學任數學教員。蘇德戰事發生後，索氏於一九四一年十月入伍，服役於砲兵隊，曾兩次受勳，一九四五年升任上尉。隨後發生的事情使他的生活發生了重大的變化。⑦

他與在另一單位服役的尼古拉·維克維奇通信批評了史達林，因而於一九四五年七月被捕，未經審判便判了八年徒刑。這八年中一部份時間是在莫斯科一所囚禁科學家的特別監獄；這一段生活供給他後來寫「地獄第一層」的資料和靈感。其餘的年月是在集中營林立的卡拉甘達省內、卡爾拉格集中營渡過；這段經驗產生了他一九六二年出版的第一篇小說「伊凡·丹尼索維奇生活中的一天」。於一九五三年自集中營放出又被判「永久流放」，流放到哈薩克斯坦南部。在那裏他患了胃癌，被送到塔什堪治癒。這段經歷又產生了數年後寫出的「癌症病房」。

一九五六年索善尼辛被赦，從流放中回來，次年「復原」，在距莫斯科約一百哩的利亞站任數學教員。但是十一年的囚禁與流放生活，使他無法忘懷那些所見所聞的悲慘景象，那數以百萬計囚民的苦難和冤情。他默默的教書，也默默的寫作，所寫大都是暴政所帶給無辜人民的折磨。

他第一篇小說「伊凡的一天」，一九六二年在「新世界」上發表，有賴於黑魯曉夫上台後暫時的寬鬆政策。「伊凡的一天」描述的集中營生活是史達林治下的時代，正合於黑魯曉夫的貶史政策，遂得刊出。隨後他又又有幾個短篇被錄用。當時的蘇聯「文學報」曾讚賞的評論：「他的才華獨特而驚人。今後他筆下所寫將生動的引人入勝。」⑧

蘇俄文壇暫時的「解凍」也隨着黑魯曉夫的下台而又漸漸凍結。索善尼辛的暴露黑暗文章已爲官方所不容。從一九六五到一九六七他已成爲秘密警察的一個注意對象。「地獄第一層」描述科學家們的獄中情形被禁出版，連

帶當時已經付排的「痛症病房」也從排印機上抽下來。這兩篇手稿流入當時已盛行的「地下出版」，民間私相傳讀。不久又流傳至西方；一九六八年這兩本書遂在西方出版，轟動一時。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蘇維埃作家聯合會開除索氏會籍。一年以後，他得到更大的補償——諾貝爾文學獎。一九七一年他的新作歷史小說「一九一四年八月」在西方出版，成為暢銷書。同時他在國內的處境也就日趨困難。

三

從蘇俄當局對諾貝爾獎金的態度，也可略見他們對文藝活動的戒心。俄人作家中先後有四人得諾貝爾文學獎。一九三三年得獎的伊凡·布寧（一八九七—一九五三）自一九一九年便流亡國外。死後曾被他的祖國追加「復原」。但是在「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二日）真理報為文紀念他百歲冥壽時，並未提及諾貝爾獎一事。第二位得主是「齊格伐醫生」（一九五八）的作者派斯特耐克（一八九〇—一九六〇），他於被迫放棄諾貝爾獎後，不久也就離開這個世界。第三人是「靜靜的頓河」（一九二八—一九四〇完成）而聞名的肖霍洛夫^⑧。肖氏的阿諛作風可與中共的郭沫若相比，成了御用文人。所以只有肖氏於一九六五年得獎後能在蘇俄當局的同意下赴瑞典親身接受這份光榮。派斯特耐克與索善尼辛得獎時，蘇聯報紙皆毀瑞典學院保守落伍，並且說一九〇一年第一次的諾貝爾文學獎就給錯了人——頒給了法國詩人 Sully Prudhomme 而未給托爾斯泰。

索善尼辛被選為一九七〇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後，決定不去瑞典參加盛典，主要原因是恐怕出國後被撤回護照變相放逐。他的顧慮當然有理由。自六十年代中期文藝控制加緊後，知識份子因作品與言論被囚禁、送入精神病院，或變相放逐的時有所聞。僅舉其最引人注意的，一九六六年判處了辛尼雅夫斯基和丹尼爾七年與五年徒刑，就因為他們各在國外出版作品。青年歷史學者阿瑪利克也遇到同樣命運，一九七〇年被判刑三年，去年期滿之際又續判三年。曾熱心於人權運動的物理學家查利茲 (Valery Chalidze)，於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得蘇俄政府允許應邀赴美作學術演講。到美不久蘇俄使館便將其護照收回，因國內已取消其公民資格。一九七三年蘇俄生物學家 Z·密德維捷夫在英國也遇到同樣遭遇，他是獲准到英國作研究工作，也被取消公

民資格。也有因編纂文件或幫助抄打文件而判刑的。例如一九六八年亞力山大·金茲保因編寫辛尼雅夫斯基和丹尼爾受審紀錄而被判刑五年；卓諾維爾因編輯一項烏克蘭的審判紀錄而判刑三年；拉式冠娃因幫助金茲保打字而判刑一年。一九六八在列寧格勒有三人^⑩因閱讀並傳遞遭禁文學而分別被判刑一年、三年、四年。其他類似案件不勝枚舉。

在這種情形中，索善尼辛當時的處境並不是獨特的例外；可能的遭遇，也有許多先例可以比照。後來事態演變得比較更為突出，索氏倔強的性格當然是一個因素，更重要的自然是作品的內容。在他的兩部新作裏，他否定了俄共所標榜的帶有宗教信仰形式的基本信念：列寧的偉大和共產主義的歷史必然性。

四

索善尼辛承襲了俄國文學優美的寫實派傳統。他寫作態度嚴肅、忠於真實；幽默處不在表面，常摻合着沈痛，這當是因為他生活中充滿了悲慘的記憶，這悲慘的一面却未使全文陷於沈悶。他生活在共產制度之下，壯年的十一年在集中營中渡過，他作品所反映的現實就自然以這些經歷與體驗為主。自他第一篇小說「伊凡的一天」發表後，有許多有過囚禁經驗的人便設法將自己的經驗告訴他。這本新書「古拉格羣島」便是基於二百二十七位嚐歷過那種痛苦刑罰的人所供給的資料。

這本書裏^⑪一再說明蘇俄一切暴政雖由史達林「發揚光大」，却是由列寧奠定了基礎。作者在書中提及列寧在一九一八年一月所發表題為「如何組織競爭」那篇文章^⑫。列寧說要將俄國國土上所有的害蟲都清除出去。他所说的害蟲不僅指階級敵人，連偷懶裝病的工人也包括在內。索善尼辛述及列寧時期所設立的特務組織，由 Cheka 而 GPU，並例舉許多那時期所發生的殘暴事實。他寫：「回想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這段時期，我們所遭遇的困難是：對於未進入牢房便已整死的所有囚徒，是否應當給予一個分類的罪名？那麼被『窮人委員會』從村蘇維埃的羽翼下拖出來，或在院子後面就地幹掉的人們，應當將他們列為那一類？」^⑬他隨後舉出多起在那幾年無罪名而殘殺的人。在蘇聯將殘暴歸咎於史達林已不是新題目，列寧則應該是幾乎「神聖」的。在蘇俄引用了列寧的話後面都加上章節的註明，一如基督教徒引用

聖經註明章節相同。索善尼辛在如此環境下却不能容忍真實永遠被遮瞞下去，而指出列寧的罪狀，這當然是「異端邪說」。

除此以外，他在這部新書中對二次大戰中蘇俄降德的伏拉索夫也以同情的觀點重新評價。關於在他率領下的那部份軍人，索氏寫道：「我想在這本書裏告訴大家一個全世界歷史上沒有聽到過的事實：數十萬年齡二十到三十歲的青年，與邪惡的敵人連合在一起反對自己的祖國。」^⑭這自然也是公然「反叛」，與俄共正統解釋正面抵觸。

否定共產主義在歷史演進中的必然性是索氏上一部書的主題——就是一九七一年出版的歷史小說「一九一四年八月」。其中描寫第一次大戰初期，俄軍進入東普魯士、在潭尼堡之役中俄軍潰敗的一段。作者筆下所顯示出俄軍將領之庸碌無能，軍心之散渙，足使任何煽動任何暴動都容易成為成功的革命。這不啻否定了俄共最基本的信念——或說他們必需使人民相信的信念。可以想見自此書出版後，何以索氏彷彿一再作準備後事的打算。「古拉格」稿件的查獲觸發了已存在的火藥。

「古拉格」出版後，自由國家輿論大都表示對作者敬佩。但也有認為索氏有世界輿論支持，自然敢與俄共當局對抗，並認為他蔑視當局的態度不如派斯特耐克的沈靜^⑮；或認為自由世界反應有些不免感情用事。在蘇聯國內「持異見」的學者文人自然也表示支持。物理學家撒哈羅夫仍然領先贊助。另有兩位文人因同樣表示支持索氏已被作家協會開除了會籍：六十六歲的女作家朱可夫斯卡亞於今年一月十日被除名，四十二歲的作家伏諾維奇於二月二十日被除名。極為活躍的詩人葉伏圖善珂也因對索善尼辛表示同情，而被當局取消了已訂好的葉氏作品欣賞會。

在許許多多的稱讚與詆毀的評論中，蘇俄歷史學者，R·密德維捷夫的評語值得注意。他說：「無人從史達林可怖的『羣島』中出來時會與他當初進入時相同，這不只因為年齡和健康的改變，而更因為他對生活與人已有了新認識。同樣，我想很少人在看完了這本書之後能與他剛剛打看第一頁時完全相同。」^⑯

索氏放逐後一再說到他要力爭在自己國土上居住的權利；也一再表示，他寫書的目的是希望將本國歷史的真相告訴本國人，尤其是青年一代。蘇俄當局則是希望在流放後的索氏失去他的影響力，也使本國青年聽不到他的

言論。雙方的希望各能達到多少，自難預料。自由世界、尤其西方，對支持索氏所表示的熱烈、自然出於對他作品與精神的愛好與敬佩，但其中也不免有英雄崇拜的感情，這種成份在危難解除後容易減退。慎重的觀察家已對西方的「輿論界」提出自我警告。謹引用美專欄作家賽佛爾的幾句評語作結：「在國內，索善尼辛是一個持異見的作家，是對蘇維埃極權政治的一個測驗；在國外，他是一位文學巨星，測驗我們判斷力的理智性和我們良知的一貫性。」^⑰

註①日本每日新聞(英文)，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第三頁。註②The Current Digest of Soviet Press, Ohio State University, Vol. XXV, No. 52, January 23, 1974, p.3.註③Edouard Dillon 報導，法新社莫斯科電，日本每日新聞(英文)，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日，第二頁。註④國際先鋒論壇報，一九七四年二月四日，第五頁。註⑤同上。註⑥國際先鋒論壇報，一九七四年二月十六、十七日，第一頁。Hedrick Smith自莫斯科報導。註⑦Leopold Labedz edited, "Solzhenitsyn, A Documentary Record,"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1, pp. xvii-xviii.註⑧或Alexander Solzhenitsyn, "Stories and Prose Poem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71, 中引用。註⑨讀者文摘資深編輯John Barron的新書KGB內曾敘及在俄人中盛傳的一項消息：「靜靜的頓河」並非肖洛霍夫所寫。很多人支持此種說法，謂該書原稿為一白俄官員所寫，此人被處死刑，而肖洛霍夫為其案檢察官。Barron之書一九七四年一月出版。註⑩三人為Yuri Gendler, Lev Kachevsky和Anatoly Studentkov.註⑪此書其他文字的翻譯本尚未出版。紐約時報曾刊載摘錄。台北聯合報將紐約時報之摘錄譯為中文，連載於民國六十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五日該報。註⑫英文版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冊，四〇四—四一五頁。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4. 註⑬聯合報，民國六十三年一月二日。註⑭聯合報，民國六十三年一月十日。註⑮以前的哥倫比亞駐俄大使 Gonzalo Canal Ramirez 所說。見日本時報(英文)，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五日，第一版。註⑯國際先鋒論壇報，一九七四年二月七日，第一—二頁。註⑰William Safire, "Solzhenitsyn Without Tears," 國際先鋒論壇報，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日。